

○ 美术考古学丛书

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

——以关中地区为考察中心

罗宏才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重点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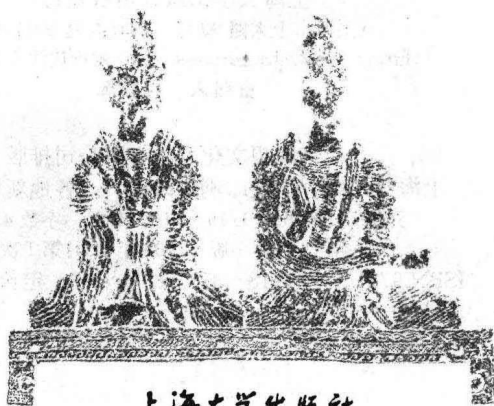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项目资助出版

○
美术考古学丛书

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

——以关中地区为考察中心

罗宏才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以关中地区为考察中心/罗宏才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 12

(美术考古学丛书)

ISBN 978-7-81118-378-8

I. 中… II. 罗… III. ①佛像-石刻造像-研究-关中 ②道教-石刻造像-研究-关中 IV. K87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2021 号

责任编辑 傅玉芳 柯国富

封面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金鑫 章斐

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

罗宏才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4.25 字数 438 000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8-378-8/J·148 定价：52.00 元

总 序

美术考古学属于考古学和美术史相互渗透的学科增长点,它同时注重发挥美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和图像学等学科与之交叉的优势,从而形成的新学科。过去,我们对美术考古学的认识,通常都将其归属于考古学或美术史学,近几年国内外学术界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表明,美术考古学属于独立的新学科是不争的事实。为此,展开对美术考古学学科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独立学科的美术考古学,它的研究不是简单地对“逝去”物品的发现与发掘,重要的是通过美术考古的重新审视:以文化的理念,揭示对象的文化意义,因为任何一件“过去”的物品,随着时间的流逝,物品之中总在不断地沉淀着文化;用审美的眼光,发现对象蕴涵的美的因子,从而再度激活起这些物品。正是因为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广博性和重要性,以及研究层面的不可替代性,使美术考古学近年来在国内外有了较快的发展。

然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其学科的系统研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美术考古的研究,一方面是注意于方法层面的开展,另一方面是学科的意义主要隐于考古学或美术史的研究之中。近年来,随着人文科学研究整体化,学科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叉越来越频繁,边缘新兴学科也随之不断涌现,作为学科的美术考古学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重新又进入人们的学术视野。通过对研究现状的梳理,国外有很多

学者已经将美术考古学作为独立学科而展开系统研究。为此,国内学术界对美术考古学学科的关注与研究理应成为重要选题。

本套丛书共 10 本,包括:《美术考古学学科体系》、《美术考古与美术史》、《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美术考古与艺术美学》、《中国古代绘画的知识考古》、《美术考古一万年》、《中国美术考古研究现状》、《西部美术考古》、《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美术考古与文化资产——以台湾地区学者的论述为中心》等。

《美术考古学学科体系》是论述与求证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与美术学交叉新学科成立的必然,其中包括对美术考古出现的探源、发展历程的梳理、理论的建立与方法的探寻、学科体系的建立与论证等。《美术考古与美术史》、《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美术考古与艺术美学》、《中国古代绘画的知识考古》是从美术考古学与其相关学科的关系的角度,运用美术考古学方法解决相关问题所作的研究;《美术考古一万年》是对美术考古学的实践研究与理论总结;《中国美术考古研究现状》是对中国大陆美术考古学研究成果的梳理、评述;《西部美术考古》、《美术考古与文化资产——以台湾地区学者的论述为中心》与《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是美术考古学的个案研究。

美术考古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不仅将丰富的考古成果和深厚的美术史积淀互相渗透而寻找到新的学科增长点,同时也吸收国内外最新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而运用于学科的建设之中。美术考古学是交叉学科,但并非是边缘化学科,相反,它所具有的综合符合多元化发展的社会潮流,使其在交叉研究古老的对象时,迅速进入了当代学科的最前沿。同时,美术考古学也进入了教学领域,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等教学和研究单位先后开设了该学科的博士和硕士专业方向,促进了学科的发展。迅速发展新兴学科,需要理论上的及时总结;而且,相关研究者也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展示自己的最新成果和了解最新研究动向,本丛书的编写即是基于这一目的,出发点既在学科建设本身,同时也是努力于人文研究的有机结合。

本丛书主要由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美术考古研究中心教授集体完成,少量选题邀请了本学科校外专家参与撰写。我们希望本丛书作为一批比较集中的研究成果推出,不仅有利于美术考古学学科建设的完善,同时它将成为当代人文学科研究的一个亮点而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广泛瞩目。

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美术考古学丛书”主编 沈莹

序

序
001
回

任继愈先生在《道藏提要·序》中说：“儒家学者总是怀有偏见，认为佛、道两教的典籍价值不大。我们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整体来看，佛、道两教的文化与儒家传统文化同样重要，同样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佛教、道教的影响，其深程度当不在儒家经史子集之下。”“道教生长在中国本土，约与佛教同时活跃在舞台上。但道教命运不济，错过大发展的时期，让佛教占先了一步。一步落后，步步落后，二千年间，一直没有能超过佛教。”“道教整理典籍的做法是从佛教那里学来的。佛教最先称自己的全集为‘一切经’，道教编辑道教全集也称‘一切经’。由于‘一切经’这个名称被佛教占用在先，后来道教的‘一切经’则称为‘一切道经’，以区别佛教的‘一切经’。”

罗宏才先生的新著《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把佛道造像碑并列提出，是很准确的。

先是马长寿先生(1913—1999)著《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根据所见关中碑刻 25 种，内汉族 4 种、羌族 5 种、匈奴 2 种、氏族 1 种，对碑主进行精辟的论证。罗君所著，继续了这一传统。我认为也是正确的。

“历史是人的作品。”(黑格尔 G. W. F. Hegel 语)历史主要是群氓的历史，是草根民众的历史。罗君从陕西所见近 300 通造像碑作研究，重视碑主、供养人的题名，考察他们的族属。从中又选择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姚伯多(道教)造像碑》、正光元年(520)《雍光里邑子(佛教)造

像碑》、北周保定至隋开皇间(580—600)《马宝(道教)造像碑》作示例性辨析,细致地对族属及相关身份等列表比较,具体考察,做出相应的结论。这种做法值得高度赞许。他说:姚伯多属“西羌大姓”。《雍光里邑子(佛教)造像碑》列名 395 人,实际可查者 325 人,其中辨出以汉姓为主者 298 人,占 91%;余为匈奴、氐、鲜卑、羌 12 姓,共 22 人。《马宝(道教)造像碑》则属汉族家族造像碑。

“五胡”名称最早出自苻坚(338—385)之口,“次序”也是苻坚讲的。(陈寅恪先生语)在秦时函谷、武胜、大散、萧关四关之内的渭河流域,分布甚为集中。江统(256?—310)在《徙戎论》中论:“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

相对于南方,这个区域的天灾、人祸频仍,人民的生活遭遇比较艰辛痛苦,各族人口的流动,史不绝书。如晋元康六年至八年(296—298),雍、秦二州连年干旱,关中饥疫,米斛万钱,数万家百姓迁入汉中,流人要求“寄食巴蜀”,迁入南阳的雍州流民,数近 10 万;永嘉四年(310)秦、雍等六州爆发严重蝗灾,“食草木、牛马毛,皆尽”。此为天灾。大兴三年到咸和五年(320—330),迁入长安的氐、羌部落万余户、20 余万口,杨、姜等族、夷豪迁入者 2 000 余户;太和五年(370)前秦灭前燕,贵族及鲜卑 4 万余户被迁入长安。此等人口流动,都属人祸。

我国传统思想当然主流是几乎无所不包的儒法学说,但不具备中亚、西方的宗教形态。灾难中的民众信仰,多半只能选择现实性、明确性、功利性的佛、道两教。两者强势,开始以来就旗鼓相当,不相上下。

十六国时期,长安先后是匈奴族刘渊前赵、氐族苻坚前秦和羌族姚萇后秦的建都所在。新疆、辽宁边区不论,关中及扩大地区的敦煌石窟为西魏、前秦所开凿,麦积山炳灵寺、庆阳南北石窟、龙门、云冈、巩县石窟,均为北魏所开凿,太原天龙山石窟为东魏、北齐所开凿。其中敦煌、庆阳、巩县、太原,都有中心塔柱式石窟。罗君论证造像碑源自石窟中心塔柱,可以视为定论。

相关佛经之中,《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佛说安宅神咒经》都在东汉时已经译出。《佛说报恩奉盆经》、《佛说辟除贼害咒经》在东晋时已译出。《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由唐代于阗国三藏提云般若译出,《佛说造塔延命功德经》也在唐代由罽宾国三藏沙门般若译出。它们都是经由“丝路”传入的。

由于瘞藏佛祖舍利的佛塔,长期是信众礼拜的中心对象,信众礼拜时必须绕行。文献中多有记载。如中土第一佛寺白马寺,礼佛者曾“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太平广记》卷 93 引《法苑珠林》说:唐高宗乾封二年(667),“每年年时,供养古塔”。卷 69 引《河东记》,记唐文宗太和二年(898),长安城南慈恩寺塔院,月

夕见美妇人从三、四青衣，“来绕佛塔”，言笑甚有风味。早于唐代，慧皎《高僧传》13《唱导》一节中，曾提到“八关初夕，旋绕周行，烟盖停氛，灯帷靖耀”。

罗君论著中，详考佛教“右旋”（道教“左旋”）。据唐代于阗国三藏沙门实叉难陀译《佛说右绕佛塔功德经》，“右旋”可得的果报，多达38款：“在胎及生时，令命常安乐”，“住常安乐”，“福命长远”，“富贵多财宝”，“仓廩常丰足”，“远离八难”，“眷属皆爱念”，“衣服常无垢，仪貌常端正”，“安乐常无病”，“灭一切烦恼”，“净眼修且广，犹如青莲花”，“父母及亲戚，一切共鞠养”，“夜叉诸恶鬼，不能暂惊怖”，“自在王阎浮，率土咸归化”，“大势转轮，十善御群生”，等等。凡此种种，无一不是芸芸众生及基层官绅在日常生活中，日日期盼、最最祈求的目标。首先是群众的需求，其次是统治者的参与、扶持。

冯友兰先生（1895—1990）指出：“道教从佛教借来了许多东西，包括宗教体制、仪式，以至其大部分经典的形式”。（《中国哲学简史》）他具体指出：“道教是模仿佛教的。”“道教后来模仿佛教，发展出道观（寺庙）、道士（僧人）和道场法事（仪式）。”

北魏有力地改革道教的寇谦之，陈寅恪先生曾论证寇的家世、佛教律学、佛教医药、天算之学对寇的影响（《佛教三题》）。

在斋戒仪式中道教全搬佛教的规范。斋法中转经、唱赞等等都传自印度。“斋”，梵名“乌哺沙他”（Upavasatha）。[隋]慧远的《大乘义章》12论：“防禁故名为戒，洁清故名为斋。”过正午不食之法叫“斋法”。[唐]般刺密帝译《楞严经》一曰：“严整威仪，肃慕斋法。”这种种的文本信息和规范、结果，都只能浓缩凝固在“四面体”碑这一载体之中了。

“碑”，《说文解字》曰“竖石也”。段玉裁注引《聘礼》郑玄注说：“官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其材官庙以石，窆用木。《檀弓》：‘官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注曰：‘丰碑斲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竖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缠绕。’”按此（《檀弓注》），即《聘礼注》所谓：“窆用木也。非石而亦曰碑，假借之称也。秦人但曰刻石，不曰碑，后此凡刻石皆曰碑矣。”“凡刻石必先立石，故知竖石者，碑之本义，官庙识日影者是”。

“碑”在古代与门“阙”、楼“观”配套。故造像碑有具顶作庑殿者。

罗君论著，紧密结合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印度塔庙、支提与本土庑殿碑石的建筑文化，天竺石窟造像与中国石雕、图画文字的艺术创作于一体，是一部集前人、当代学人成果的空前的学术性著作。他在方法上采用了考古类型学，兼及文献、比较方法与统计方法。

“任何真理都应当是‘具体’的。”(黑格尔《逻辑学》)罗君通过田野作业、调查研究等具体方法,在造像碑的主题之下,全面、系统、深入、具体地作出相应的结论;分区、分期、定名、模式、样式、面序、组序、位序、题名、文字、书人、刻工,包括像主尊的服式、坐式、持物都一一作了考证。有些探索与结论,是前人所误作的、疏漏的。

具体解剖一只“麻雀”标本,宣示了带普遍性、规律性的特征。

大中见小,小中识大,著者撰写出了一部中世纪关中地区最基层劳苦大众的社会生活史。它的价值与意义,我以为展现了劳苦大众的心灵与面貌、苦难与希望的图卷。一一表列出来的,虽然是有男有女的具体个人,却不能不反映了这些个人的本质。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作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论著的出版,必然会引起跨越国界,如越南、缅甸、斯里兰卡、印度、朝鲜与日本相关学人的关注。

由于此书主题涉及面广,有待继续调查研究的学科很多,只是在大量插图、表格外,地图的采用稍感不足,然无论如何;专题的基础已经奠定,局面已经展开,前景应当看好。

王瑶先生分学术论文为四类:

一曰有口皆碑,成为定论;

二曰自圆其论,言之成理;

三曰虽有偏颇,不乏创见;

四曰人云亦云,空话连篇。

此本专著,应可列在第一类,不知读者们以为如何?

章学诚(1738—1801)在《文史通义》中有言:“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察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答客问》中)。

本著作实践了这种论断,相信读者当可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梁白乐

2008年12月30日于南京咏梅山庄倚竹园

(作者系前南京博物院院长)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 001

第一节 目的与意义 / 001

第二节 相关问题研究的简要历史回顾 / 018

第三节 关于取材、结构以及研究方法的说明 / 029

第二章 造像碑概念的源流与生成 / 034

第一节 乾嘉以前“造像碑”概念的生成源流 / 034

第二节 造像碑生成概念的阐释与相关因子之提取 / 040

第三节 两类造像碑界分与造像碑生成概念的认定 / 049

第三章 造像碑源流的讨论 / 056

第一节 造像碑源流的探索 / 056

第二节 六种例证与相关问题 / 080

第四章 造像碑的定名与考古学分类 / 095

第一节 造像碑的种属甄别与定名 / 095

第二节 造像碑的考古学分类/116

第五章 分期、分布、集群模式与地域样式/128

第一节 分期、分布/128

第二节 集群模式与地域样式/200

第六章 造像碑面序与图像、题名之连缀释读及组、位序的确定/220

第一节 “旋行”理论与佛道融合/220

第二节 四面面序的确定/248

第三节 供养人图像、题名之连缀释读与组、位序的确定/262

第七章 造像碑面序与图像题名组、位序所反映的问题/278

第一节 从面、组、位序重新探讨姚伯多造像碑/278

第二节 “州郡令长”等主要供养人题名、位序性质考辨/300

第三节 书者题名、位序与相关问题/314

第四节 师、匠题名、位序与“北地样式”的讨论/321

第八章 新理论视野中的造像碑示例研究/337

第一节 北魏正光元年“雍光里邑子造像碑”初探/337

第二节 马宝造像碑示例剖析与相关问题考论——兼论北魏至隋唐道教造像主体风格之演变/379

结 论/419

002



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 424

一、中文部分 / 424

二、日文部分 / 435

三、西文部分 / 439

后 记 / 440

目

录

003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目的与意义

四世纪以至六世纪,是中国历史从空前分裂走向空前统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内,曾经浪漫两汉的传统经学与青睐“本体”的魏晋玄学已走向式微^①,代之而兴的是推崇“谦退远害”的本土道教与宣扬“慈悲利生”的外来佛教^②。社会的激烈动荡、道释的“相激相生”^③、民族的迁徙融合以及各种不同文化的交融碰撞,使得这一时期呈现出浪漫多姿、深邃广阔的多元历

① “玄学”的解释有多种。卿希泰等人认为:“玄学是‘有无’、‘本末’、‘质用’、‘一多’、‘动静’等成对范畴为主要内容的本体之学。”参见卿希泰:《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②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附录二《道教形象考》引王淳《三教论》,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③ 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267页。关于道释“相激相生”的解释,姜文先后引用方东美的《中国大乘佛学·引论》(见《中国大乘佛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1年版,第23页以及[日]福井文雅的《道教和佛教》(见《道教》第二卷《道教的展开》,东京:平河出版社)的观点以作阐述。方东美认为:六朝隋唐之世,中国学术文化上面有一个大的复兴,这个复兴“凭藉老庄的精神,去吸收外来的大乘佛学般若学里面高度的智慧,形成高度的哲学,然后以这类哲学重新振作起来,把中国人颓废的精神激扬了之后,变成创造的精神”。福井文雅进而解释道释关系称:“以往的研究者着重关心的是发现道教和佛教的相似点。”“但是,如相反从道教立场来考虑,则会研究佛教从道教中吸取了什么。”福井文雅认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几乎是零,而在论述佛、道二教的相互关系中,这一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史层面,成为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哲学、艺术学、民族学、建筑学等诸多相关学科研究者所共同关注的焦点。面对这一共同关注的焦点,我们注意到了中国佛道教造像碑相关问题研究这一重要研究主题,并试图以堪为中国佛道教造像碑(以下或简称作“造像碑”)渊藪的关中地区为基本观察中心,希冀通过多元、立体的综合研究手法,科学有序地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分析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预先要从时、空概念上来框定这一研究主题,主要基于以下五种原因:

一、特定的历史地域与历史条件

四世纪以至六世纪,在长达二百余年的历史空间内,关中地区承载了中国历史从动荡分裂走向基本统一的主流轨辙,具有控扼丝路腹地枢纽,连接贯通凉州、云冈、龙门三大佛教艺术模式以及融合、链接六朝政治、经济、文化精髓余绪的独特地位。

在这一特殊地域内,号称“清德隐仙”的北魏天师寇谦之(365—448)^①,曾师事佛陀跋陀罗,通禅法,往西秦,隐居麦积山,“大流法化”并为之献身的“禅学宗师”玄高(402—444)^②,均曾生长斯地,他们戚里相近,人脉相接,以超群的人格魅力与执着的宗教信仰心态,先后左右并影响了北魏一朝甚嚣尘上的佛、道两教。

寇、玄以外,“内行深浅,未易可测。外缘所被,多诸灵验”的东晋僧人道安(312—385)^③,“道流西域,名被东国”的前秦高僧鸠摩罗什(344—413)^④以及后来受姚萇、姚兴器重,敕为僧王(僧统)的鸠摩罗什高足僧超并号为“秦人解空第一者”之僧肇^⑤,还有被称为“自道流东夏,味静乃斯人乎”的北周禅师僧实(476—563)^⑥等,也都曾不辞辛劳,迢迢奔波,负笈长安,驻锡传

① 《魏书·释老志》,卷一百一十四,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3052页。

② [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玄高本传》,卷八,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点校本,1992年。

③ [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道安本传》,卷五,中华书局点校本,1992年。

④ [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鸠摩罗什本传》,卷二,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点校本,1992年。

⑤ 参见释宝唱(约495—515时人):《名僧传》,卷30。

⑥ [唐]道宣:《续高僧传·僧实本传》,卷十六,《大正藏》,卷五十,第557页。

灯。其中道安领衔组织昙摩难提翻译《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三法度论》，僧伽提婆翻译《阿毗昙八犍度论》，鸠摩罗跋提翻译《毗昙心论》、《四阿谶暮抄》，昙摩鞞翻译《摩诃钵罗蜜经抄》，耶舍翻译《鼻奈耶》等译经大典，终在长安获取“学不师安，义不中难”^①之弥天盛誉。尤当一提的是，鸠摩罗什氏鼓噪造像积福，其对尔后中国佛道教造像历史曾经产生极大影响的《法华经》^②，更首先在长安一地译出并转而流播浪漫中土南北各地的。至于牵动朝野、震撼史册的三次废佛狂潮，亦均以长安为中心发源之地，波及全国。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称长安为译经重镇^③，许理和(Erik Zürcher)《佛教对中国的征服：佛教在早期中世纪中国的传播与适应》一文则谓“北方佛教以长安为中心”^④。固皆精辟议论，决非虚妄。因此，选择框定这一特定的时空概念，已非一般意义上的某一地理区域、某一历史阶段的定位概念所能等同替代。

二、得天独厚的研究资源

据《陕西省文物地图集》1998年11月公布资料^⑤，截至1994年底，陕西一地所发现的北魏以至北宋的各代造像碑计110处，近300通^⑥，其中绝大多数为1949年以后相继发现，属北朝者约占三分之二，集中分布在西安(长安)附近长武、彬县、旬邑、永寿、淳化、咸阳、高陵、蓝田、宜君、黄陵、洛

① [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道安本传》，卷五，汤用彤点校，中华书局点校本1992年。

② 又称《妙法莲华经》。如《大正藏》第九册第八页下至第九页上引鸠摩罗什译《法华经》：“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象，刻雕成众相，皆已成佛道。或已七宝成，瑜石赤白铜，白蜡及铅锡，铁木及与泥，或以胶漆布，严饰作佛像，如是诸人等，若伎人，皆已成佛道。乃至童子戏，若草木及笔；或以指爪甲，而画作佛像，如是诸人等，渐渐积功德，具足大悲心，皆已成佛道。”

③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6页，汤氏原语为“长安译经遂称重镇”。

④ [荷]许理和(Erik Zürcher)著，李四龙等译：《佛教征服中国》(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Leiden; E. J. Brill, 195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⑤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从严格意义讲，该书公布的300通“造像碑”中有一些属于“造像”，不能算作“造像碑。”

⑥ 该项资料统计数据若按本著底定的新理论分野，有些在学理划分上原则应划入“造像”范畴而未必属于“造像碑”范畴。

川、铜川、耀县^①、富平、蒲城、临潼、华县、白水等区、县、市。这其中尚未包括近十年来新发现的造像碑资料以及甘肃、宁夏两省(区)历史上属于关中范围的庆阳、固原等地的造像碑资料。当然,依照严格意义上的造像碑概念,上述资料实际上未必都应归属于造像碑的范畴。但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关中地区所发现的造像碑数量仍在全国占有首要的位置。

除过独占鳌头的宏富数量之外,关中地区又是全国最早出现佛道造像碑地区之一。据笔者列表统计认定^②,截至目前,全国范围内所发现的五世纪末期以前的造像碑共计四通,其中两通在长安附近的耀县地区,另两通在毗邻长安的古凉州地区。在这四通最早的造像碑中,尤以凿于北魏始光元年(424)的耀县魏文朗造像碑最富研究价值、最具代表意义。“因其成于太武帝灭佛之前的北朝初期,而格外引人注目。更因融合佛教道教于一碑,乃目前所知此类造像碑中最早者,并与北朝新天师道首领寇谦之创立道教尊神形象同为一年,从而堪称国中一绝。”^③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

以上得天独厚的研究资源,无疑是破解五至九世纪中土地区佛道教造像碑源流轨迹、信仰群体、信仰对象、信仰方式、造像意匠等复杂奥秘的一把钥匙,又是研究五至九世纪中土地区宗教、哲学、艺术、民族等多学科的天然活化石,蕴涵有十分引人入胜的研究空间以及许多“重大的难题”^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任何一个轻视或放弃这一时空的选择,都可能轻易扬弃诸多弥足重要的文化资源与历史信息,产生无谓的失重以及令人遗憾的结果。

三、极具魅力的释道“相激相生”特色

张燕认为:“早期道教造像艺术,发现资料甚少,在这方面的研究与佛教

① 耀县今改为铜川市耀州区。考虑到历史上相关著述与称谓对耀县行政区划的历史性、依附性,本著中或有称之为“耀县”者。

② 参见本著第三章第一节附录“表3-1-1目前被认定为年代最早的五种造像碑示例相关资料统计”。

③ 李淞:《魏文朗造像碑考补》,《文博》1994年第1期,收录于李淞:《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39页。有关魏文朗造像碑的年代问题,目前国际学术界争论甚烈,尚无定论。此处暂依李淞之说。

④ [美]阿部贤次(Staley K Abe):《陕西省的北魏雕刻:来源、赞助、愿望》(Northern Wei Sculpture from Shaanxi Province: Provenance, Patronage, Desire),收录于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479页。

相比几乎形成空白。由此,渭北地区的有关早期道教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就全国来说,目前所发现的五世纪以至九世纪的道教与佛道混合造像碑约有七十余通,而关中地区就有五十余通,占“全国已知同类资料的百分之八十以上”^①。有意味的是,这些道教资料的集中分布地区,竟与上述关中地区造像碑的集中分布地区如出一辙。更令人惊异的是,在渭北地区属于北魏北地郡境内的耀县、铜川、富平等相关市、县以及属于北魏冯翊郡境内的临潼栌阳等区、镇发现的道教与佛道混合造像碑尤为集中,形成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特殊地域中心。而临潼栌阳地区的道教造像碑及佛道混合造像碑碑体雄大、雕凿精细,构思奇特,被“称为造像之大观”^②。其发愿合资造像之邑子结社群体数量较大,结构较为单一,民族族属多为汉族,在形制、内涵、主题、风格等方面,都与耀县、铜川、富平等相关市、县(区)有着显著的区别。它们所强劲昭示的两种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不同风貌的地域造像样式^③,无疑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与更为深远的研究底蕴。

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与特定的历史地域内,一种专门的学术资料赫然位居全国之首,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密切关注。检索历史文献资料,曾经风行一时的汉魏“五斗米道”教徒的长驱北上,是关中地区道教兴盛的主要历史原因与根本社会基础,而承传“五斗米道”要旨迅速勃兴的北魏天师道以及道教古灵宝派在关中地区的漫溢流播,则是造就以上现象与数字的直接原因。《高僧传》卷十一称:“释玄高,姓魏,本名灵育,冯翊万年人也。母寇氏,本信外道。”汤用彤考证认为:“按寇谦之亦为冯翊万年人,玄高与之同县。”^④两个曾经在佛道教历史上风云一时的领袖人物同为乡里,可能尚有戚谊之好,且均出身汉族上流阶层,而寇谦之尚为“南雍州刺史赞之弟,自云寇恂之十三世孙”^⑤,同与植根于中土地区的传统道教以及外来的佛教有着藕断丝连的不解之缘。如此,属于冯翊郡境内万年县境栌阳地区集中展现、独具特色的

① 张燕:《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序言》,参见陕西省耀县博物馆等合编:《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叶昌炽撰,柯昌泗评,陈公柔、张明善点校:《语石·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9页。

③ 这两种地域样式,著者暂定为“北地样式”与“栌阳样式”。其中北地样式将在本著第七章第四节专题进行讨论,栌阳样式则在本著之外另行撰文讨论。

④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2页。

⑤ 《魏书·释老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3034—3035页。